

解 构 大 师 · 第 一 篇

福柯站到了悬崖边，却没有桥

——解构福柯：最接近"发生"的人，与他缺的那三样东西

王德生 著

德麦国际 Demai International

本文导读 福柯是两千五百年权力思想史上，把镜头掉转得最彻底的人——他不再问「谁拥有权力」，而问「权力如何发生」；他把权力从高处的王座，拉到了每个人的身体、时间、知识与自我；他证明了主体不是一切的先在起点，而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结果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是 SDE 发生学最深的同路人。但福柯缺三样东西：一把判定「是不是权力、有多深」的**尺子**，一套组织权力多维运作的**坐标**，以及那个起而反抗的「我」究竟**从哪里来**的根据——他站到了自己凿出的、西方思想史上最深的一道悬崖边，却没有桥。本文以 SDE 发生学与《权力为何物》为背景，先完整走过福柯的全部贡献，再在他的悬崖上，架起三座桥。

壹

一个把镜头掉转过来的人

在权力这件事上，两千五百年里，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同一个方向看。

他们盯着高处——君主的王座、国家的印玺、阶级的顶端、精英的密室。权力被想象成一样东西，摆在世界的某个中心，被某个主体拿在手里，然后自上而下地施加、命令、镇压。研究权力，就是去追问：谁坐在那个中心？他凭什么坐在那里？该不该由他坐？两千五百年的权力思想，无论多么精巧，大体都在这个"谁在统治"的问题里打转。

然后，二十世纪下半叶，有一个人把镜头整个掉转了过来。

他不再往高处看，他往末梢看。他去看监狱里的作息时间表，看学校里课桌的排列方式，看医院里一份份病历档案，看军营操练手册上分解到秒的动作，看忏悔室和诊室里那些关于欲望的絮语。他说：别再问权力是什么、谁拥有它了；要问的是，权力如何运作——在什么地方、通过什么技术、产生什么效果。他说，权力不是一样可以被谁攥在手里的实体，它是遍布在整个社会肌体里的、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关系和策略的网；它不是自上而下的，而是自下而上地、从无数个微小的接触点上运作起来的；那个高踞王座的、宏大的主权权力，不过是无数微观机制的收编和叠加。

他叫米歇尔·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。

这一记镜头的掉转，是权力思想史上最深刻的一次转向。在福柯之后，人文学科的几乎每一个角落——历史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、文学批评、性别研究、后殖民理论——都回荡着他的回声。"权力无处不在""知识就是权力""规训社会""主体是被建构的"——这些今天已经成了知识分子日常口头禅的说法，源头几乎都能追溯到他。

而这篇长文要做的，是一件比赞美更难、也更值得的事。

因为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里，福柯是离一个东西最近的人——离"发生"最近。前面几篇长文，我们解构过柏拉图、康德、尼采。柏拉图在天外盖了先在的理念界，康德在人脑里盖了先天的认知框架，尼采砸掉了这两座房子却又立起了先在的权力意志。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为"先在"辩护，都缺一样东西：**发生**。而福柯不同。福柯几乎已经站到了"发生"的门口——他拆掉了先在的主权者，拆掉了先在的主体，他反复地、执着地追问一切东西是"怎么被生产出来的"。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带着发生学的气味。

但他在门口停住了。

而他停住的地方，恰恰暴露出：这位最接近"发生"的思想家，手里缺三样关键的东西。缺了这三样，他能把权力的运作描述得纤毫毕现，却给不出一把能判定"这里到底有没有权力、有多深"的尺子；他能证明主体是被权力生产出来的，却给不出那个起而反抗的"我"到底从哪里来；他触到了那条一直在流的发生之河，却因为手里没有"河"这个正面的词，只能一遍遍地说"这里没有中心、那里没有本质"。

他站到了悬崖边——一道他自己凿出来的、极其深邃的悬崖。但他没有桥。

这篇长文，是"解构大师"栏目的第一篇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把福柯推下悬崖，恰恰相反——福柯是这条路上最值得敬重的先行者，他把很多人不敢拆的东西拆掉了，把很多人看不见的机制照亮了。我们要做的，是走到他停住的地方，看清他缺的那三样东西是什么，然后，在他的悬崖上，架三座桥。

贰

规训：他把权力的作业面，从高处拉到了身体

要理解福柯的贡献有多大，得先跟着他的镜头，走进那些没有人看的地方。

《规训与惩罚》这本书，开篇是一段让人不适的酷刑描写——一个弑君者被当众处以极刑，肢体被撕裂、被火烧。但福柯写这段，不是为了渲染残酷。他要让你看见的是一个对比：几十年后，同样是惩罚，形式完全变了——不再是当众撕裂身体的酷刑，而是一份精确到分钟的监狱作息时间表。几点起床、几点劳作、几点用餐、几点就寝，每一个动作都被规定、被监视、被记录。

福柯要问的是：从"撕裂身体"到"编排时间"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？

答案是一整套全新的权力技术，他给它起了个名字：**规训**（discipline）。

规训不摧毁身体，它生产身体——生产一种"驯顺而有用"的身体。它靠的是一套极其精细的技术。**时间的编排**：把一天切成可以核查的片段，让每一分钟都有它该做的事。**空间的分割**：让每个人都有、且只有一个固定的位置，像修道院的格子、教室的座位、工厂的工位——你在哪里，一目了然。**动作的分解**：把一门技艺拆成可以逐步训练的标准单元，士兵的持枪、工人的操作、学生的书写，都被拆成一

个个规定的分解动作。**检查**：把每个人变成一份可以被反复测量、被累积的档案——你的每一次表现，都被记下来，攒成一份关于你的记录。**层级监视**：让"看"的目光布满整个空间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有。

用发生学的语言说，规训干的是一件极其精准的事：它是对 D2 的微观占领。

这需要解释一下。在 SDE 发生学里，一个人的存在，是显露（S）、差异序列（D）、纠缠（E）三维的持续发生。而 D2，是差异序列里"路径组织"那一层——你怎么走、按什么步骤、以什么节奏。规训的高明之处，恰恰在于它**不去改你的目标宣言，也不去发布什么命令**，它直接去改写你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格时间、每一寸空间，让你行走的路径本身，长成权力想要的形状。它不告诉你"要做什么"，它安排你"怎么做"，而当"怎么做"被完全占据时，"做什么"就已经被暗中决定了。

这是福柯了不起的第一步：**他把权力的作业面，从高处的王座，拉到了每个人的身体上**。在他之前，人们谈论权力，谈的是主权、法律、命令、镇压——都是宏大的、显性的、自上而下的东西。福柯让人第一次看见：真正塑造一个现代人的权力，不在议会的辩论里，而在他每天被规定的坐姿、被切割的时间、被打分的表现里。权力最深的作品，不是让你服从一道命令，而是把你雕刻成一具特定的身体。

这一步，发生学百分之百地接受，而且要为它鼓掌。因为这正是发生学一直在说的：**最深的塑造，从来不发生在显性的命令层，而发生在路径与土壤被悄悄改写的地方**。福柯用监狱、学校、军营、工厂的一手档案，把这件事证明得铁证如山。

但也正是在这里，福柯缺的第一样东西，开始露出端倪。他看见了权力在身体上、在路径上的精细运作，他把这套运作描述得纤毫毕现——可是，他给不出一把尺子，去判定这套运作里，哪一处是"权力"、哪一处只是"影响"，哪一处深、哪一处浅。他有了显微镜，却没有刻度。这把缺失的尺子是什么，我们要到后面才能完整地看清。先让我们继续跟着他的镜头，走到那座著名的建筑跟前。

叁

全景敞视：一座完美的建筑，与它缺的那把刻度

规训的全部技术，最后凝结成了一座建筑的构想。这座建筑，是福柯思想里最著名、最有力的一个意象——**全景敞视监狱**（Panopticon）。

这个构想本来是十八世纪的哲学家边沁提出的。它的结构极其简单，也极其精巧：一圈环形的牢房，每一间都朝向中央的一座瞭望塔。塔里的看守，能看见每一间牢房里的一举一动；而牢房里的囚徒，因为光线和百叶窗的设计，永远看不见塔里到底有没有人。

福柯一眼就看穿了这座建筑的全部秘密，而这个秘密，恰好是发生学"不对称"判据的一个完美教具。

看它的第一层：可见性被这座建筑**做成了严格的单向**。看守能看见囚徒的一切，囚徒却看不见看守的任何。用发生学的记号写出来，就是——看守对囚徒的改变能力（ $\partial \text{囚} / \partial \text{塔}$ ）巨大无比，而囚徒对看守的反向改变能力（ $\partial \text{塔} / \partial \text{囚}$ ）等于零。一方能彻底地改变另一方，另一方却完全无法反向改变这一方。这是不对称性达到极致的样子。

但真正的杀招，在第二层。

正因为囚徒永远不知道此刻塔里到底有没有人在看，他就必须**假定自己始终被看着**。于是，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了：他把那个监视的目光，安装进了自己的内部。看守可以下班，可以离开瞭望塔，可以根本不在——可是监视照常运转，因为囚徒自己接替了看守的工作，自己监视自己、自己约束自己、自己审查自己。

权力在这里达到了它最省力、也最深的形态：它不再需要出场。它已经变成了囚徒自己内心的一双眼睛。狱卒下班了，囚犯自己值守。

福柯的先知性在于，他看见这座建筑正在挣脱监狱的围墙，泛化成整个现代社会的图式。学校、医院、工厂、办公室——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复制着这座全景敞视监狱的逻辑：让你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被评估、被打分、被记录，于是你自己把那个评估的目光内化，自己盯着自己，自己为达不到标准而焦虑。福柯没能活到智能手机的年代，但那句话——"不再需要瞭望塔了，每个人手里的那块屏幕，就是塔"——完全长在他画出的延长线上。

到这里，福柯的洞察力已经令人叹为观止。他不仅描述了一种权力技术，他还预言了它的未来。

可是，让我们停下来，问一个福柯自己没有问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。

全景敞视监狱固然是不对称的极致——但福柯凭什么说它是"不对称"的？他靠的是直觉，靠的是那个单向可见性的画面给人的直观冲击。他没有一把尺子，能把这种不对称量出来、写下来、和别的关系比较。这在全景敞视监狱这样极端的例子里，似乎不成问题——不对称明摆着。可一旦离开这种极端例子，走进真实生活里那些模糊的、双向的、纠缠的关系，福柯的"直觉"就不够用了。

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，一个医生和一个病人，一对父母和一个孩子，一个平台和一个用户——这些关系里，到底有没有权力？权力朝哪个方向？有多强？多深？多久？福柯的整套理论，能把这些关系里权力的"运作方式"描述得极其生动，却答不出"有多少"。他会说"权力无处不在"——可正是这句话，暴露了他最大的软肋：**一个无处不在的东西，就无处可以被检验。**如果权力在朋友的互相启发里也在、在恋人的彼此改变里也在、在师生的教学相长里也在，那么"这里有权力"这个判断，就不再能区分任何东西，它就退化成了一种氛围、一种修辞，随时可以被套用到一切关系上，也就随时可以被反驳。

这就是福柯缺的第一样东西：一把**最小判据的尺子**。他有权力运作的全部显微图像，却没有那把能判定"这是不是权力、有多深"的刻度。而这把尺子，恰恰是《权力为何物》为他准备的第一座桥——我们放到后面来架。先跟着他，走进他第二件重武器。

肆

知识—权力：他把两样东西焊在了一起

福柯手里的第二件重武器，是一个连字符：**知识—权力** (pouvoir-savoir)。

这个连字符，不是在说那句老生常谈的"知识被权力滥用了"。福柯要说的，是一个远为深刻的发生学命题：**知识和权力，是互为发生条件的**。

让我们看清这句话的分量。规训靠什么运作？靠分类、靠统计、靠档案、靠检查。可这些东西——分类、统计、档案、检查——同时也正是现代知识的方法。于是福柯发现了一件让整个学院坐立不安的事：现代关于"人"的科学，它们的诞生地，不是安静的书斋，而是那些规训的机构。监狱里，诞生了犯罪学；医院里，诞生了临床医学；学校里，诞生了教育学和心理测量学。**关于人的科学，恰恰诞生在人被固定、被观察、被记录的那些地方**。

而反过来，每一门这样的科学，又为权力提供了新的作业面：更精细的分类，让权力能更准地识别你；更准确的预测，让权力能更早地干预你；更深入的知识，让权力能更细地塑造你。

用发生学的语言说，这是一条典型的互生回路：**权力铺设了知识得以发生的土壤 (E)**，**知识又回过头来改写了权力运行的路径 (D)**。权力创造了那些机构、那些档案、那些被观察的身体，知识才得以在这片土壤上生长；而长出来的知识，又反过来给权力提供了更锋利的工具。福柯了不起的地方，是他用档案馆里的尘埃，为这条抽象的互生回路，做了扎扎实实的历史实证。

这条回路最日常、也最阴险的产品，福柯给它起了个名字：**正常化判断** (normalisation)。

这个词值得慢慢说，因为它是福柯离发生学最近、也最锋利的一笔。现代社会用什么来评判每一个人？用平均值、用标准差、用发育曲线、用智商分布。统计学的那条正态曲线——中间高、两边低的钟形曲线——披上了一件叫"科学""客观""自然"的外衣，成了裁决每一个人的标尺。而福柯要戳穿的是：**"正常"不是一个被发现的事实，而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规范**。没有什么天然的"正常人"在那里等着被发现；"正常"是被那条统计曲线、被那套测量制度，一点点生产出来的。

这一笔为什么锋利？因为它揭示了一条完整的、跨越好几个层面的权力链条。用发生学的坐标看，正常化判断做的是一次跨角度的转化：**它先把一个数学角度的东西（你偏离均值几个标准差），转化成一个评价角度的东西（你被判定为"发育迟缓""心理异常""绩效末位"），再转化成一个身份角度的东西（你**

成了"差生""病人""失败者")。一个冷冰冰的数字，先变成一句带着褒贬的评价，再变成"你是谁"的一部分。数学→评价→身份，一条链子，把一个测量结果，最终焊进了一个人的自我认同里。

福柯把这条链子的运作，描绘得入木三分。任何一个曾经因为一个分数、一个诊断、一个排名而重新认识（并贬低）自己的人，都能在福柯的分析里，认出自己被制造的过程。

但是——注意，福柯缺的第二样东西，也正是在这最锋利的地方开始显形。

福柯能把主体"被生产"的过程描述得如此透彻，以至于他给自己挖了一个致命的坑。如果关于"人"的知识是被权力生产的，如果"正常"是被制造的，如果连一个人用来认识自己的那套范畴都是权力递给他的——那么，请问，那个能够看穿这一切、能够起而反抗的"福柯自己"，又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一切主体都是被权力生产的，那个批判的主体、那个反抗的主体，凭什么能站到权力之外去批判、去反抗？福柯拆掉了所有的裁判席，包括他自己发言所需要的那一张。

这个坑，我们后面会专门来填。它是福柯思想里最深、也最著名的一道裂缝，批评者称之为"规范缺失"。但要看清它有多深，我们得先跟着福柯，走完他最后、也最彻底的一步——走到他把权力的镜头，从个体的身体，拉升到整个人口的那一刻。

伍

词与物：他挖出了"知识的地层"，却把它冻成了新的先天

在走向生命权力之前，必须先补上福柯思想里另一座高峰——一座和我们解构过的康德，隔空相望的高峰。

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之前，福柯写过一本更艰深、也更惊世骇俗的书，叫《词与物》(Les mots et les choses)。这本书的结尾，抛出了二十世纪最著名的一个断言："人"将被抹去，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。

要理解这句话，得先理解福柯在这本书里挖出的东西。他像一个考古学家，一层层地挖开西方几百年的知识，结果发现：每一个时代的知识——它的生物学、它的经济学、它的语言学——表面上五花八门，底下却共享着同一套深层的、无人言明的规则。这套规则规定了：在这个时代，什么样的东西才算得上"知识"，什么样的陈述才算得上"真"，事物要按什么方式被排列、被关联、被谈论。福柯给这套深层规则起了个名字：**知识型** (épistémè)。

而福柯挖出的最惊人的一件事是：**知识型是会整体断裂的**。从文艺复兴，到古典时代，到现代——西方的知识型经历过两次剧烈的、不连续的断裂，每一次断裂，整个"什么算知识"的地基都换了一副。而"人"这个概念——那个作为认识的主体、又作为被认识的对象的"人"——福柯说，它不是永恒的，它

是现代这一层知识型的产物，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。既然它是被某一层知识型生产出来的，那么当知识型再次断裂时，"人"也就会像沙滩上的一张脸，被海浪抹去。这就是那句"人之死"的全部含义：**作为一切知识之中心与基础的"人"，不是先有的，而是被某一套深层知识规则暂时生产出来的。**

看到这里，你应该感到一种熟悉的震动。因为这，几乎就是我们在解构康德时说过的话的历史学版本。

康德说，有一套先天的认知框架——时间、空间、十二范畴——它先于一切经验，对所有理性存在者都一模一样，永恒不变。任何东西要进入我们的经验，都必须先被这套框架格式化。而我们解构康德时说：不，这套框架不是先天的，是**发生**的——它是认识主体在漫长的、与世界的纠缠中，一层层沉淀、稳定、固化下来的，沉淀到骨子里，深到让人误以为它先于一切。

福柯的知识型，简直就是康德那套先天框架的一次伟大的"历史化"。福柯做对了康德没做对的一半：他证明了那套规定"什么算知识"的深层框架，**不是先天的、不是永恒的、不是对所有人一样的**——它是历史的产物，它会断裂，它会被另一套取代。在这一点上，福柯比康德前进了一大步，他把康德冻在"先天"里的东西，重新泡回了历史的流动之中。这是福柯的功绩，发生学要为它鼓掌。

但是——就在这里，福柯犯了一个和他刚刚纠正的康德，形式上几乎一样的错误。

他把知识型，**冻成了一个新的先天。**

在福柯的描述里，一个时代的知识型，是一套铁板一块的、笼罩一切的深层结构。它规定了这个时代能思考什么、不能思考什么；生活在这个知识型里的每一个人，他所有的思想、所有的知识，都被这套结构预先决定了。知识型像一个无形的牢笼，罩住了整整一个时代——**在一个知识型内部，没有人能够思考它之外的东西。**而知识型如何断裂、为什么断裂、断裂的动力从哪里来，福柯几乎说不清——他只是描述断裂"发生"了，一层换成了另一层，中间是一道无法解释的鸿沟。

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福柯把"先天框架"从康德那种"永恒不变、对所有人一样"的形态，换成了"每个时代一套、会整体断裂"的形态——他历史化了它。但他没有把它**发生化**。在每一个时代**内部**，知识型仍然是一个先有的、笼罩一切的、铁板一块的框架，它先于这个时代的一切知识而存在，决定这个时代的一切思想。福柯只是把一个大的先天，切成了几个时代性的先天，一段一段地摆在历史里——可每一段之内，它还是先天的。

用发生学的眼睛看，福柯缺的是同一样东西：他不知道，那套深层框架不是"先于一个时代而存在、决定这个时代"的先天结构，而是这个时代无数具体的知识实践、在无数具体的纠缠里，**持续发生、并不断回写自身**的沉淀。知识型不是一个笼罩者，而是一个沉淀物——它每时每刻都在被这个时代的具体实践重新塑造，也每时每刻都在塑造着这些实践，二者是互生的，不是单向决定的。正因为它是被持续发生、被不断回写的，所以它才会"断裂"——所谓断裂，不是一个先天框架神秘地换成了另一个，而是底

层的发生累积到某个临界，旧的沉淀被冲垮、新的沉淀开始成形。福柯看见了断裂这个"结果"，却因为手里没有"发生"这个引擎，说不清断裂这个"过程"。

这个诊断，恰恰预演了福柯后来那道最深的悬崖。因为如果每个时代的知识型都笼罩一切、决定一切，那么——福柯自己，又是站在哪里，才能看穿这一切知识型、才能写出《词与物》这本书的？如果知识型是一个无人能思考其外的牢笼，那福柯这本"看穿了所有知识型"的书，本身又是从哪个牢笼之外写出来的？"人之死"的宣告者，站在哪里宣告？这个在《词与物》里就已经埋下的矛盾，正是"规范缺失"那道悬崖的第一次隐现——它会在福柯走到"主体的生产"时，彻底爆发。而它的解药，也和那道悬崖的解药是同一个：反身不可封顶。知识型之所以会断裂、之所以没有哪个牢笼能真正笼罩一切，正是因为生活在其中的、会为自己建模的人，永远保有那个溢出牢笼、重新发生的可能。这一点，我们留到架桥的那几节，再完整地说。

陆

性史：他把最私密的欲望，也还原成了被生产的东西

如果说《规训与惩罚》拆的是身体，《词与物》拆的是知识，那么《性史》（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）拆的，是现代人以为最私密、最属于自己的那样东西——欲望。

福柯的《性史》开篇，就砸碎了一个几乎人人都信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叫"压抑假说"：它说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，性被压抑了、被禁言了、被关进了卧室的黑暗里，而现代人的任务，是把这种被压抑的性解放出来、让它重见天日。这个故事如此深入人心，以至于"性解放"成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一面旗帜。

福柯说：这个故事，从根子上就错了。

他用大量的历史材料证明：现代社会不但没有让性沉默，反而催生了一场关于性的、空前的话语大爆炸。从教会的忏悔，到医学的病理分类，到心理学的性心理研究，到人口学的生育统计，到法律对性犯罪的界定——现代社会不停地在**谈论性、盘问性、分类性、记录性**。性非但没有被禁言，反而被制造成了一个必须不断被言说、被审查、被知晓的对象。**权力对性做的，不是压抑，而是生产——它生产出关于性的无穷话语，生产出"性倒错者""性心理正常与异常"这些身份类别，生产出一整套让每个人都必须通过"性"来认识和坦白自己的机制。**

这是福柯又一次精彩的镜头掉转。所有人都以为权力对性的作用是"压下去"（压抑），福柯让人看见，权力对性的作用其实是"生出来"（生产）。而这背后，是一台古老的机器在运转，福柯称之为**忏悔的技术**。从中世纪教徒向神父的忏悔，到近代病人向医生的倾诉，到现代人向心理咨询师、向访谈者、向社交媒体的自我披露——你被反复地要求"说出你真实的欲望""坦白你内心的秘密"，而你以为这是在解放自己、在做真实的自己。福柯要揭穿的是：**恰恰是在这种"说出真实自己"的坦白里，你被生产成了一**

个特定的主体。你用来坦白的那套语法、那套"什么是正常欲望、什么是变态欲望"的范畴，是权力递给你的；你越是真诚地坦白，你就越是深地被这套范畴塑造。

这一步，和发生学的判断再一次深深共振。因为它触到了那个最私密、最被认为"属于自己"的领域——欲望——并证明了：连欲望，连那个"我真正想要什么"的内核，都不是先有的、纯属自己的东西，而是在一整套话语、机构、权力关系里被发生、被塑造出来的。这正是发生学一直在说的：不存在一个先有的、纯粹的"我"，站在那里拥有着它天然的欲望；"我"和"我的欲望"，都是在纠缠里被持续发生出来的。

而福柯晚年在《性史》的后几卷里，做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——他把镜头转向了古希腊罗马，去研究古人如何**对待**自己的欲望。他发现，古人关心的不是"我的欲望是不是正常"（那是现代人被生产出来的问题），而是"我如何**运用**我的快感、如何**塑造**我自己"。福柯从中提炼出一个概念：**自我技术**（technologies du soi）——人可以主动地、有方法地作用于自己的身体、灵魂、思想，把自己塑造成某种样子。

这个转向意味深长。因为福柯在这里，隐隐地、笨拙地，想为他那个被拆得只剩碎片的"主体"，找回一点主动性——如果主体不只是被权力生产，如果它还能通过"自我技术"反过来塑造自己，那么反抗、自由、伦理，似乎就有了一线空间。福柯晚年几乎是急切地朝这个方向走去。

可是他走得磕磕绊绊，最终没能走通。因为他缺一样东西——他缺一套能说清"这个能自我塑造的主体，它的主动性从哪里来"的正面机制。如果主体彻底是被生产的，那"自我技术"里那个"自我"，凭什么能主动？它主动的能力，又是谁给的？福柯感到必须给主体留一个能动的位置，却说不清这个位置的根据。他晚年对"自我技术"的执着，其实是他对着那道"规范缺失"的悬崖，做的最后一次、也最动人的填补尝试——他想用"自我可以塑造自我"来填平"反抗的我从哪里来"。可他手里没有那条定律，填不平。**"自我技术"是福柯伸向悬崖对岸的一只手，却始终没能搭到桥。**而那座桥的桥墩——反身不可封顶——恰恰能说清他说不清的：主体之所以能"自我技术"、能主动地塑造自己，正是因为它是反身的，它对自己的每一次建模、每一次塑造，都在溢出原来的自己、发生出新的自己。福柯伸出的那只手，发生学能接住。

柒

生命权力与治理术：从"使人死"到"使人活"

晚期的福柯，把他的镜头又推远了一层。他不再只盯着一个个被规训的身体，他开始看整个"人口"。

他发现，现代权力和古典权力之间，有一个根本的翻转。

古典时代的主权，它的标志性权力是什么？是"使人死"的权力——君主握有的是让你死的权利，除此之外，平时任由你活着。生杀予夺，一个"杀"字，是主权最鲜明的印记。

而现代治理的标志，福柯说，恰好翻了过来，变成了"使人活"的权力。现代权力关心的，是出生率、死亡率、发病率、预期寿命——它以促进、优化、调节"生命"的名义来运行：疫苗接种、卫生规划、人口政策、健康档案。它不再主要盯着"让谁死"，它盯着"让人口更健康地活"。

福柯给这种新形态起了个名字：**生命权力** (biopouvoir)。

生命权力和规训不一样。规训作用于一个个具体的身体，把每一个身体训练得驯顺有用；生命权力作用于"人口"这个统计学意义上的身体，它的工具是概率、是曲线、是阈值。而由此，福柯引出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个概念：**治理术** (gouvernementalité)。

治理术的精髓在于：它不直接命令任何一个人。它只调整环境的参数、调整激励的结构，让千千万万个"自由的选择"，在统计上，落进它预设好的那个区间里。它不对你说"你必须这样做"，它布置一个环境，让你"自愿地"这样做，而当千万人都这样"自愿"时，整体的结果，恰好是它想要的。

用发生学的语言说，这是对 E 的批发式经营。它不去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的这一步路径，它去改所有人共同浸泡在其中的那个条件分布——它经营的是纠缠的土壤本身。你以为你在自由地选择，其实你的每一个选项、每一种倾向，都被那个被精心调整过的环境预先塑造了。

这是福柯全部洞察里最深、也最贴近当代的一层。今天，当一个算法通过调整推荐参数，让亿万用户"自愿地"把注意力停留在它想要的地方；当一个平台通过设计默认选项，让千万人"自愿地"授权、续费、公开隐私——运行的，正是福柯所说的治理术。他在几十年前，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，画好了图纸。

治理术的可怕，恰恰在于它把权力藏进了"自由"本身。规训还留着强制的痕迹——你能感到那张作息表、那道监视目光是外加于你的；而治理术连这点痕迹都抹掉了，它让你在"自由选择"的体验中，落进它排好的结果里。今天有一门显学，叫如何设计"选择的架构"——把哪个选项设为默认、把哪个信息放在最显眼处、用什么措辞去描述一个选择——研究的正是：如何在不剥夺任何人"选择自由"的前提下，让绝大多数人的选择，落到设计者想要的那一边。默认勾选的续费、精心排布的信息流、设计成"愿意/以后再说"而非"愿意/不愿意"的弹窗——每一个都没有强迫你，每一个都让你"自己"选了它想要的。这是治理术在数字时代的完美兑现：**最深的权力，不是让你做它想让你做的事，而是让你'自愿地'想要它想让你想要的东西，并且真诚地相信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**福柯看穿了这套机制的逻辑，只是他没能看到，这套逻辑会在他身后，被一块块发光的屏幕，实现到何等精密的地步。

而生命权力这个概念，还带出了一个极其尖锐的伦理两难，这个两难，发生学要郑重地把它记下来：**以"生命"之名的权力，是最难被拒绝的权力。**谁能反对健康？谁能反对活得更久？正因为它以生命、健康、安全为名，它几乎豁免了一切质疑——而恰恰因为它难以被质疑，它的反向通道，也就最容

易失修。一套以"为你好"为名义的权力，最容易变成一套没有人能反向约束的权力。这道两难，福柯敏锐地感觉到了，但他没有能力给出一把判定的尺子——什么时候"为你好"是真的育成，什么时候它滑向了不受约束的支配？他缺的还是那第一样东西：一把判据的尺子。

现在，让我们走到福柯思想的最深处，也是他把楼梯走到底的那一层——主体的生产。走到那里，我们就能同时看清他最伟大的贡献，和他最深的那道悬崖。

捌

必须保卫社会：他把政治看成战争的延续，却停在了"战争"这个先在物上

在生命权力和主体化之间，福柯还留下了一组讲稿，题目叫《必须保卫社会》。这组讲稿里，藏着福柯对权力最激进、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判断，值得单独拆开。

我们熟悉一句名言，是克劳塞维茨说的："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。"意思是，战争服务于政治，是政治手段用尽之后的延伸。而福柯做了一件惊人的事：他把这句话**反了过来**。他说——**政治，是战争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。**

这个反转的意思是：不要以为和平是常态、战争是例外。福柯说，恰恰相反，在一切看似和平的社会秩序底下，一直涌动着一场没有停止的战争——一场关于支配的、力量对力量的持续较量。法律、制度、秩序，不是战争的终结，而是战争的另一种形态：胜利者用制度把某一次力量对决的结果固定下来，让它以"和平""秩序""正当"的面目继续运行。所谓的社会和平，是一场我们已经忘了它是战争的战争。

沿着这条线，福柯做了一件当时惊世骇俗的事：他去追溯"种族战争"这套话语的历史。他发现，近代欧洲曾有一整套"两个种族之间持续斗争"的历史叙事——一个民族征服了另一个民族，被征服者的后代与征服者的后代之间，有一场跨越世代的、暗中的战争。福柯追踪这套"种族斗争"的话语，如何一步步演变，最终在十九、二十世纪，被国家收编、被扭曲成了那种以"净化种族""保卫种族纯洁"为名的、杀人的国家种族主义。这是福柯对现代国家如何一手"使人活"（生命权力）、一手又能以生命之名"让另一些人死"（国家种族主义）的最深揭示。

这套分析的锐利，无须多说。福柯让人看见：秩序不是战争的反面，权力关系的底层，涌动着从未平息的力量较量。这份洞察，发生学是接受的——它和发生学的一条判断相通：任何看似稳定的显露（S），底下都是差异（D）的持续推进从未停止，稳定只是差异被暂时收束成了秩序的样子，而不是差异消失了。福柯说"和平底下是没停的战争"，用发生学的话说，就是"秩序底下是没停的差异运行"——稳定态从来不是静止，而是动态被暂时锁定的形态。

但是——福柯在这里，又一次停在了一个先在物上。

他把"战争"当成了权力的底层真相、当成了那个不再需要追问的最终解释。在福柯这里，一切权力关系，追到根，都是"力量对力量的战争"——战争是底，是最深的那一层，是权力的本来面目。可是，发生学要追问：**战争本身，又是怎么发生的？"力量对力量"这个图景，真的是最底的那一层吗？**

不是。"战争""力量对决"这个图景，仍然是一个需要被继续往下追问的东西，而不是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底。因为"力量对力量的较量"这个说法，暗含着一个未经检验的预设：有两股先存在的"力量"，然后它们相遇、对决。可这恰恰是发生学要拆的——**力量不是先存在的、然后才相遇的两个东西；力量本身，是在关系里、在纠缠里被发生出来的。**没有先存在的两股力量摆在那里等着开战；有的只是一个不断发生着不对称的关系场，而"力量""对决""战争"，是我们回过头去，为这个不对称的发生所贴的一个（战争的）标签。

这就是福柯"政治即战争"这个判断的限度。他把权力从"法律—主权"这个太表面的模型里拆了出来，这一步对了；但他把权力换成了"战争—力量"这个模型，就以为触到了底，其实还差一层。"战争"是一个比"法律"更深的模型，但它仍然是一个模型，不是那个最底的发生本身。发生学要说的是：权力的底，不是"力量的战争"，而是"存在的 SDE 不对称性改变的发生"——战争，只是这种不对称发生在剧烈、对抗的情形下的一个特例，一个显露的样子，而不是它的本质。福柯把一个特例（对抗性的不对称）当成了全体（一切不对称），把一个显露（战争）当成了那个发生本身。

而这个限度，恰恰又通向了那把尺子。因为"战争—力量"的模型，天然就是二元对立的、你死我活的——它擅长描述那些剧烈对抗的权力，却拙于描述那些温和的、育成的、甚至充满善意的不对称：一个好老师对学生的塑造、一个医生对昏迷病人的照护、父母对婴儿的养育。这些关系里有巨大的不对称，却根本不是"战争"。福柯的战争模型，在这些地方失灵了——因为它缺一把能中性地测量不对称、而不预设"敌我对决"的尺子。而这把尺子，正是我们下面要架的第一座桥。

玖

主体化：权力最深的产品，是"你"

福柯的整个思想，是一部一层比一层深的下降。

第一层，权力压制你的行为——这是最表面的、人人都懂的权力。第二层，权力塑造你的偏好——让你想要它想让你想要的东西。而福柯走到了最深的第三层，一个几乎没有人敢走到的地方：**权力生产主体本身。**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福柯说，权力不只是压制一个先存在的主体，也不只是塑造一个先在主体的偏好——权力**制造**出那个主体。它通过让一个人承认关于自己的某种"真理"，把这个人牢牢地绑定在一个身份上，让他从此用这

个身份来认识自己、监督自己、改造自己。

"我是一个同性恋""我是一个抑郁症患者""我是一个问题少年""我是一个奋斗者"——福柯要揭示的是，这些"我是……"的句子，不是你在描述一个先在的自己，而是权力关系把你生产成了这样一个自我。你借以认识你自己的那套词汇、那套范畴，是权力递给你的。忏悔的技术，从中世纪的教堂，迁移到了近代的诊室、访谈间，再迁移到今天的社交媒体自我披露——你被邀请说出"真实的自己"，可是你用来说出自己的那套语法，早就被权力准备好了。

这是福柯全部工作的顶点。他证明了：主体，那个西方哲学从笛卡尔以来奉为一切基础的、最确定、最先在的东西，其实是权力关系的产物之一。

而这个顶点，恰恰与发生学的一条最核心的本体论命题，深深地共振。

发生学有一条最反直觉、也最锋利的判断，叫**三号位显影律**。它说：**主体不是预设的起点，而是显影的结果**。在 SDE 的框架里，客体意识、互动意识、主体意识，被安放在三个不同的"号位"上，而主体意识居于第三号位——它不是那个从一开始就坐在中心、统摄一切的先在起点，而是在客体经验和互动经验都充分发生之后，才最后一个被点亮的东西。婴儿的发展恰好验证了这个次序：他最先获得的是客体经验（"那儿有一个东西"），然后是互动经验（"有件事正在发生"），最后、最晚才发生的，才是主体经验（"我在这个场景里，有一个位置"）。**"我"，是最后被显影出来的，不是最先就亮着的。**

看，福柯从社会史的档案里，独立地走到了同一个判断的社会版本：主体是被生产的，不是先在的。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——福柯走的是历史学、社会学的路，发生学走的是本体论的路——却在同一个山顶上相遇了。这次相遇，是这篇长文里最值得郑重记下的一刻：**在"主体不是先在的起点、而是被生成的结果"这件事上，福柯是发生学最深的同路人。**

但是——就在这个最高的山顶上，福柯停住了。

而他停住的方式，恰恰把他缺的第二样东西，暴露得淋漓尽致。因为他证明了主体是被生产的，却给不出那个起而反抗的"我"从哪里来。他站到了他一生中最深的那道悬崖边上。

拾

谱系学：他有一把追问"怎么来的"的铲子，却没有"发生"这台引擎

在走到福柯那道最深的悬崖之前，必须先看清他手里那把铲子——因为正是这把铲子的形状，决定了为什么他能挖得那么深，又为什么在最后停住。

福柯做这一切拆解，用的是一套方法，他从尼采那里继承来，叫**谱系学**（*généalogie*）。

谱系学是什么？它是一种专门追问“怎么来的”的方法。面对任何一样被当成天经地义、亘古不变、自然而然的东西——道德、正常、理性、主体、性——谱系学不问“它是什么”（那是在承认它有一个本质），它问：“这样东西是**怎么被制造出来的**？在什么样的斗争里、由谁、为了什么，一点点长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？”谱系学要做的，是把一切“看起来永恒的东西”，还原成“曾经被制造的历史”。它翻检故纸堆，不是为了找到起源处那个纯粹的本质，恰恰相反，是为了证明：所谓的起源，是偶然的、肮脏的、充满权力斗争的；今天这个光鲜的、自然的样子，是一层层历史的偶然沉积出来的结果。

你应该立刻听出来了——**谱系学，几乎就是发生学的雏形**。它拒绝先在的本质，它追问诞生的历史，它把静态的“是什么”翻转成动态的“怎么来的”。福柯用谱系学，把道德、正常、主体、性，一个个从“永恒的本质”打回了“被制造的历史”。他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发生学的动作。在整个西方传统里，福柯（和他继承的尼采）是把这把“追问诞生”的铲子，用得最狠、挖得最深的人。

可是，谱系学这把铲子，有一个内在的限度——而这个限度，恰恰决定了福柯的悬崖。

谱系学擅长的是“破”：它擅长证明“这个不是永恒的、那个是被制造的”。它是一把极其锋利的解构之铲，能把任何伪装成自然的东西，还原成历史的偶然。但它**只有铲子，没有引擎**。它能挖开一层层的历史沉积，证明“这是被制造的”，却说不清那个“制造”本身、那个“发生”本身，是按什么机制运转的。福柯能证明主体是被谱系地生产出来的，却给不出一套正面的机制，说清“生产”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、它的引擎是什么、它为什么会往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发生。谱系学是一部只会说“这是历史的偶然”的方法——而“偶然”这个词，恰恰是引擎缺失的标志：当你说不清一件事为什么如此发生时，你就说它是偶然的。

这就是发生学与谱系学的分野，也是这篇长文最关键的一处方法论判断。谱系学问：“这个东西，服务于什么权力、在什么斗争里被制造出来？”——它追到“权力斗争”就停了，把“权力”“斗争”当成了那个不再需要追问的底。而发生学接着往下问：“这个东西，在什么样的纠缠里（E）、经过什么样的差异路径（D）、被发生成什么样的显露（S）？”——它不把任何东西当成停下来的底，它要一直追问那个发生本身的机制。**谱系学有一把追问“怎么来的”的铲子，发生学在这把铲子后面，装上了一台叫“在E中、经D、成S”的引擎**。铲子能拆穿伪装，引擎才能说清发生；铲子停在“这是被制造的、是偶然的”，引擎追到“这是如此发生的、有它的机制和约束”。

而正是这个“缺引擎”，直接造成了福柯的悬崖。因为谱系学能把主体拆成“被制造的历史”，却给不出“那个能反抗的主体从哪里发生”的正面机制——它只有拆解的铲子，没有生成的引擎，所以它挖到“主体是被生产的”就见了底，再往前，就是那道说不清反抗从何而来的悬崖。福柯手里的铲子，让他挖到了西方思想史上最深的地方；而同一把铲子的“缺引擎”，又让他只能停在那个最深处，望着悬崖对岸，过不去。

要过那道悬崖，需要的正是那台引擎。而那台引擎最核心的一个零件，就是我们下面三座桥里最深的那一座的桥墩——反身不可封顶。让我们先看清悬崖本身，再一座座地架桥。

拾壹

福柯的悬崖：他说"哪里有权力，哪里就有抵抗"，却给不出根据

福柯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："哪里有权力，哪里就有抵抗。"

这句话，被无数受压迫者、无数反抗运动引为旗帜。它听起来充满希望：无论权力多么无孔不入，反抗总会在它出现的地方一同出现。

可是，福柯说了这句话，却给不出它的根据。

这就是那道悬崖。让我们把它看清楚。福柯用他一生的工作，如此彻底地证明了：主体是被权力生产的，一个人用来认识自己的全部范畴、全部词汇、全部"真理"，都是权力递给他的。可是，如果一切主体都是权力生产的，那么——那个起而抵抗的"我"，从哪里来？如果没有一个权力之外的立足点，凭什么说规训是坏的、反抗是好的？福柯拆除了一切裁判席——他证明了每一套"客观标准""普遍真理""正常规范"都是被权力生产的建构——可是他自己进行批判、呼吁反抗，不也需要一张裁判席吗？他站在哪张席上？

批评者给这道裂缝起了一个精确的名字：**规范缺失**（normative deficit）。福柯拆掉了一切规范的地基，包括他自己批判所必需的那一块。他能无比锐利地拆穿一切，却说不清自己凭什么拆、凭什么说被拆的东西"不好"。

这道悬崖，是福柯思想里最深、也最诚实的一道裂缝。说它诚实，是因为福柯本人并没有回避它——他晚年不断地回到"主体"的问题，不断地想为那个能够"自我修养""自我技术"的主体找一个位置。他隐隐感到，如果主体只是被动地被生产，那么反抗就无从谈起；他想给主体留一个能够反过来塑造自己的空间。可是他手里缺一样东西——他缺一套能够说清"如果主体是被生产的，那反抗的能力究竟从何而来"的正面机制。他能否定先在的主体，却给不出那个反抗从哪里发生的正面根据。于是他只能在"主体是被生产的"和"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"这两个说法之间，反复地徘徊，一边拆解主体，一边又不得不为反抗留一个说不清来路的位置。

这道悬崖，和我们在解构德里达、解构尼采时看到的，是同一种悬崖。德里达证明了意义在无限地滑动，却因为手里只有"在场/缺席"的旧框架，只能把"流动"误读成"缺席"，最后停在流沙上宣布"什么都不可靠"。尼采砸掉了先在的主体，却给不出"如果主体不先在，视角到底怎么来"的机制，于是又立起了一个先在的权力意志。他们都走到了离"发生"最近的地方，然后在最后一步，因为手里缺了同样东西，停住了，甚至退了回去。

福柯没有退回去——这是他比德里达、比尼采更了不起的地方。他一直诚实地站在悬崖边上，一直在为那道裂缝寻找填补，直到生命的最后。

但他没有桥。

而《权力为何物》和它背后的 SDE 发生学，恰恰能为福柯的这道悬崖，架起那座他一生没能架起的桥。不止一座——三座。接下来的三节，我们就一座一座地架。

拾贰

第一座桥：把"无处不在"变成"处处可测"——最小判据

先架第一座桥，填福柯缺的第一样东西：那把尺子。

福柯最大的软肋，是"权力无处不在"这句话。它之所以陷入不可检验，不是因为它错了，而是因为它**缺一把刻度**。一个连续的量，如果没有刻度，就无法被测量、无法被比较、无法被检验——它就只能是一种氛围。

《权力为何物》给福柯的第一座桥，是一把极简的尺子：**权力，是关系中的不对称性改变**。

让我们看它怎么架起来。从最一般的情形开始：只要 A 发生变化时 B 也随之变化，就存在 A 对 B 的"影响"。影响是遍地都是的——朋友互相启发，恋人彼此改变，两支球队互相调整战术。如果权力就等于影响，那福柯是对的，权力确实无处不在，也确实无处可辨。

但影响要成为权力，还缺一样东西：**方向上的不平等**。朋友之间，你启发我几分，我大抵也启发你几分；而在另一些关系里，一方动一毫米，另一方动一公里，反过来却不成立。权力，出现在两个方向的改变敏感度**不相等**的地方。用一个记号写出来，就是：A 改变 B 的程度，不等于 B 反向改变 A 的程度。这就是"不对称性改变"——一把极简、却极硬的尺子。

这把尺子，恰恰给了福柯他缺的东西。福柯说"权力无处不在"，这把尺子说：不，影响无处不在，而权力是影响里那一份**不对称的偏离**。朋友的互相启发，双向大体对称，那不是权力，那是交流；老师对学生的改变远大于学生对老师的反向改变，那才是权力。同样是"改变"，判据一划，权力和非权力当场分开。

而这把尺子最妙的地方，是它把福柯的"无处不在"从一句不可检验的修辞，救成了一个可测量的连续量。有了它，"这里有没有权力""权力朝哪个方向""有多强""多深""多久"——这些在福柯那里只能靠直觉、靠氛围来回答的问题，第一次全都成了可以摆开证据来问的问题。全景敞视监狱的不对称，不再只是一个直观的画面，而是一个可以写下来的读数：看守对囚徒的改变率巨大，囚徒对看守的反向改变率为零，不对称达到极致。而一段普通的师生关系、一段亲密关系里那些模糊的、双向的权力，也终于可以被逐一测量、逐一定位，而不必再被"权力无处不在"这句话一笔带过。

这就是第一座桥的全部作用：它没有否定福柯说的"权力遍布社会肌体"这个洞察——恰恰相反，它给了这个洞察一把刻度，让"遍布"从一句无法检验的宣言，变成了一张可以逐格填写、可以拿证据攻击的地图。福柯有权力运作的全部显微图像，发生学给它配上了刻度尺。显微镜加上刻度，才成为一台真正的仪器。

而这把尺子，不只是给出一个"有多不对称"的读数，它还能拆开这份不对称，告诉你它从哪里来——这一点，恰恰能把福柯那些精彩却笼统的分析，变成可以逐条排查的诊断。《权力为何物》指出，任何一份不对称的改变，都有四个可以分别检验的来源，让我们拿福柯最爱的例子——学校——来走一遍。

输入的不对称：一方能向关系里投入更多的资源、信息、时间。学校握有的时间、师资、评价工具，是单个学生投入的无数倍。**敏感度的不对称：**同样幅度的输入，双方的响应幅度不同。老师一句评语，能在学生的自我认知里住上很多年；学生对老师的一句话，老师的反应则轻得多。**恢复力的不对称：**受到冲击后，一方迅速回弹，另一方长期变形。一次公开的羞辱，对施加者可能转眼即忘，对被羞辱的孩子可能是一道刻进神经的旧伤。**规则的不对称：**一方能修改关系的规则本身，另一方只能在规则内行动。学校可以更改课程、考纲、评分标准，学生只能适应——而规则的权力，比行为的权力深一整层，因为它改变的不是某一步棋，而是整个棋盘。

看，福柯用一整本《规训与惩罚》所描述的那套学校规训机制，在这把尺子下，被拆成了四个可以分别测量、分别干预的来源。这正是福柯的显微镜所缺的：他能把规训的运作描绘得纤毫毕现，却不能告诉你，要削弱这份不对称，该从四个来源里的哪一个下手。而一旦四个来源被分开，"反抗"就不再是一个笼统的、悲壮的姿态，而是有了四个具体的靶位——是去平衡输入，还是去降低敏感度，还是去增强恢复力，还是去夺回规则的修改权。福柯让我们看见了权力的运作，这把尺子让我们看见了权力的着力点。

拾叁

第二座桥：权力是一张矩阵，不是一团迷雾——二十七个角度

第一座桥给了福柯一把尺子。但一把尺子还不够，因为福柯笔下的权力，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——它同时在身体上、在知识里、在身份中、在空间里运作。要接住这种多维的、成束的运作，需要的不是一把尺子，而是一整套坐标。这是第二座桥。

福柯的一个深刻之处，是他看见了权力作用的地方五花八门：它作用于身体的姿态，作用于时间的编排，作用于空间的分格，作用于知识的分类，作用于自我的认同。可是福柯没有一套系统的坐标，把这些五花八门的作业面组织起来——在他那里，权力像一团弥漫的迷雾，无处不在，却也因此难以被逐

一定位。你能感到它在很多地方运作，却说不清它在**哪几个确定的维度**上运作，也说不清这些维度之间是什么关系。

《权力为何物》给福柯的第二座桥，是一套坐标系：**权力不是一个标量，而是一张矩阵。**

这句话的意思是：不存在"A对B的权力"这样一个单一的数，存在的是A的诸多角度，对B的诸多角度，一整张不对称改变的关系表。而这些角度，不是随便列出来的清单，而是沿着显露（S）、差异（D）、纠缠（E）三个维度，每个维度三层、每层三个角度，一共二十七个角度——它是"发生"这件事本身的分辨率。

这套坐标，恰好能把福柯那团迷雾，安放成一张清晰的地图。福柯说的"规训作用于身体"，在坐标上，是权力进入对方的路径角度（D2）；他说的"知识—权力"，是权力经由信息的角度（E2，符号/逻辑/数学）；他说的"正常化判断"，是一次从数学角度到评价角度、再到身份角度的跨角度转化；他说的"主体化"，是权力对自我界（E1里的自我处所）的最深占据。福柯凭直觉感到权力"无处不在"的那个"处"，在这套坐标里，第一次有了确定的地址——每一个"处"，都能在二十七个角度里被精确地定位。

而这套坐标，还顺手解决了福柯一个更深的困境。福柯的"毛细血管"图景，极其擅长解释权力**如何**运作，却拙于解释权力的**分布**为什么如此稳定地偏斜——为什么总是同样一些位置在"看"，同样一些人在"被看"？为什么不对称总是有秩序地落向同一些人？福柯对这个"为什么"，答得含糊。而一旦权力被铺成一张可以逐格测量的矩阵，这个"为什么"就有了着落：你可以逐个角度地看，不对称在哪些格子里累积、如何沉淀成稳定的分布、又如何回过头来成为下一轮的环境。迷雾一旦被铺成矩阵，"权力为什么总是偏斜"就从一个只能感叹的问题，变成了一个可以逐格追查的问题。

这就是第二座桥：**它没有否定福柯"权力弥漫于毛细血管"的洞察，它给这片弥漫的毛细血管，装上了一套坐标——让"弥漫"从一团无法定位的迷雾，变成一张可以逐格标注、可以追查偏斜之源的地图。**福柯有权力弥漫的全部直觉，发生学给它配上了坐标系。

而这套坐标真正的威力，要到你把福柯毕生的几个核心概念，一个个放进去，才看得出来——因为你会发现，福柯的每一个大概念，其实都精确地落在某一个角度上，而他之所以觉得它们彼此关联却说不清怎么关联，正是因为他没有这张能把它们摆在一起的坐标。

把福柯的概念逐一归位：**规训**，作用于身体的姿态、时间、动作——它落在差异维度里"路径组织"那一层（权力如何进入并重塑你行动的路径）。**全景敞视**，靠的是单向的可见性——它落在显露维度里"分布"那一角（谁能被看见、谁隐身，可见性如何被不对称地分配）。**知识—权力**，靠的是分类、统计、档案——它落在纠缠维度里"信息"那一层（权力经由符号、逻辑、数学而运作）。**正常化判断**，是一次从"信息"角度到"价值"角度、再到"自我"角度的连续转化（数字→评价→身份）。**生命权力**，作用于整个人口的出生、死亡、健康——它落在纠缠维度里"现实处所"那一层（权力对身体、人口这个现实基底

的经营)。主体化，作用于一个人如何认识、坦白、改造自己——它落在纠缠维度里"自我处所"那最深的一角。

看，福柯用一生、用一本又一本书分别研究的这些主题——规训、监视、知识、正常、人口、主体——第一次被摆进了同一张坐标里，各就各位，彼此的关系一目了然。福柯凭天才的直觉，感到这些主题都是"权力"的不同面孔，却始终给不出一张能同时容纳它们的地图，只能一本书研究一个面孔，让它们像散落的珍珠，各自闪光却串不成链。而这套二十七角度的坐标，就是那根把珍珠串起来的线——它让人看见，福柯毕生研究的，其实是同一张权力矩阵的不同格子，而不是一堆彼此孤立的现象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张坐标让"抵抗"也有了地图。因为每一个作为权力作业面的角度，同时也是一个抵抗的作业面。福柯说"哪里有权力哪里有抵抗"，却说不清抵抗该在哪里发生；而一旦权力被铺成矩阵，抵抗就有了确定的坐标——你可以逐格地问：这份不对称，在哪个角度上最深？我的反抗，该从哪个角度切入？是去争夺可见性的分布（不再被单向地看），还是去夺回信息的角度（拆穿那套把你分类的知识），还是去守卫自我的处所（拒绝被那套坦白机制生产）？福柯让抵抗成了一句悲壮的口号，这张坐标让抵抗成了一张可以规划的作战地图。

但这两座桥，都还没有碰到福柯最深的那道悬崖——那个"反抗的我从哪里来"的规范缺失。要填那道悬崖，需要第三座桥，也是最深的一座。

拾肆

第三座桥：反身的发生，不可被任何权力封顶

现在，我们走到福柯最深的那道悬崖前。前两座桥给了他尺子和坐标，但那道"如果主体是被权力生产的，那反抗的我从哪里来"的悬崖，还在那里张着口。

要填这道悬崖，得先回到福柯自己挖出它的地方。福柯的规范缺失，根子在一个看似无解的两难：如果主体彻底是被权力生产的，那么反抗就没有立足点（因为反抗者也是被生产的）；可如果承认有一个能反抗的、不被权力完全决定的主体，那似乎又退回了福柯拼命要拆掉的那个"先在的、自主的主体"。要么主体被彻底决定（于是没有反抗），要么主体先在自主（于是回到旧形而上学）——福柯在这两难之间，找不到出路。

《权力为何物》给福柯的第三座桥，是一条发生学的本体论定律，它恰好劈开了这个两难。这条定律是：**反身的发生，不可被任何权力封顶。**

让我们把它一层层地讲清楚，因为它是这篇长文的最深处。

什么叫"反身的发生"? 发生学区分两种东西。一块石头, 它不持有关于自己的模型——你怎么测量它、预测它, 它都不会因为"知道"你在测量而改变自己。所以物理学可以对石头做出封顶的预测。但另一类存在不同: 它持有关于自己的表征, 会读取关于自己的判断, 并因此改变自己。这就是"反身"。一个人、一个社会、一个会读取预测并调整自己的市场, 都是反身的。

而反身的发生, 有一条铁的性质: **凡是会为自己建模的存在, 它的自我建模, 就在改变那个被建模的对象; 而改变了的对象, 又溢出了原来的模型。** 你越是想彻底地把握它、决定它、封顶它, 它越是在你把握的那一刻, 因为"被把握"这件事本身, 而变成了别的样子。封顶只能无限地逼近, 却永远不能真正抵达。

这条定律, 恰好劈开了福柯的两难。它给出了福柯找不到的那个"第三种"主体——**主体既不是被权力彻底决定的(因为它是反身的, 它会因为意识到自己被塑造而溢出那个塑造), 也不是先在自主的(因为它确实是被发生、被生产出来的, 没有一个先于一切的现成内核)。** 它是被发生的, 同时又是不可被封顶的。权力可以生产它、塑造它、给它认识自己的全部词汇——这一点福柯完全说对了; 但权力封不死的, 是它用这些词汇造出新句子的那个"当场发生"的时刻。

用一句话说: **权力可以供给你认识自己的全部词汇, 却供给不了你用这些词汇造出新句子的能力。** 规训可以占领你的每一格时间, 却占领不了"占领"这件事本身在你心里激起的那一场重新发生。这, 就是抵抗的根据——它不是福柯说不清来路的神秘剩余, 也不是退回了先在自主的主体; 它是反身存在的本体论保证。

于是福柯那句"哪里有权力, 哪里就有抵抗", 第一次有了根据。抵抗之所以总是伴随着权力出现, 不是历史的偶然运气, 不是某种说不清的乐观, 而是因为: 权力所作用的那个对象——人、社会——是反身的, 而反身的发生不可被封顶。权力越是深入地塑造你, 你就越有那个"意识到自己被塑造、并因此溢出塑造"的可能。抵抗, 是写在反身存在的本体论里的。

这就是第三座桥, 也是最深的一座: **它没有否定福柯"主体是被权力生产的"这个顶点洞察——它接住了这个洞察, 然后在福柯停住的地方, 往下再挖了一层, 挖到了那个福柯没能挖到的岩床: 主体是被生产的, 但因为它是反身的, 所以它不可被任何权力封顶, 所以反抗有它本体论的根据。** 福柯站到了悬崖边, 发生学在悬崖上架起了桥——而这座桥的桥墩, 恰恰是福柯自己挖出的那道悬崖的深度。没有福柯把主体拆得那么彻底, 就没有这道需要被填的悬崖; 而正是这道悬崖的深, 成就了这座桥的高。

但架桥不是为了让人们站在桥上感叹"原来反抗有根据"。发生学的这座桥, 是能走的——它把福柯那句悬空的"哪里有权力, 哪里就有抵抗", 落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工程。因为一旦知道反抗有本体论的根据, 下一个问题就变得极其具体: **具体怎么反? 往哪里使劲, 才不是白费?**

《权力为何物》给出的答案, 先是一份冷峻的诊断。它说, 一段被权力长期塑造的关系, 其结局其实只有四种。**跃迁**: 投入真正生成了新的结构、开出了新的路径——这是唯一算数的反抗。**内卷**: 投入

越来越多，而那套塑造你的结构纹丝不动，你越使劲越累，却动不了它分毫。**轮回**：改写了一阵，却没能稳定下来，很快又被旧的环境吸了回去——年年立志，岁岁重蹈。**耗散**：在反抗中加速磨损，把自己耗尽，却没能留下任何新东西。福柯的"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"，在这份诊断面前显出了它的天真——抵抗确实会发生，但抵抗不等于跃迁；大量的抵抗，其实落进了内卷、轮回、耗散。有了这份诊断，一个人才能问：我的反抗，正在走向四种结局里的哪一种？

而真正的跃迁式反抗，发生学说，是一项改写"命运"的工程——这里的"命运"，正是权力最深的完成态：当权力深到成了你的环境、你的语言、你的判据，你以为在自由选择，其实每个选项都是它排好的，这就是命运。改写它，靠的是夺回三样被权力拿走的主权。**夺回命名权**：把那些在暗处裁剪着你的强符号——"正常""成功""失败""我们这种人"——一个个对象化，看穿它们是被生产的，然后为自己的处境换一个不含那套判决的名字。这恰恰是对福柯"正常化判断"的正面反击：福柯揭示了"正常"是被制造的，夺回命名权，就是把制造"正常"的那支笔，夺回一部分到自己手里。**夺回判错权**：为那套锁住你的逻辑安装一个"这里可以不这样"的条款，区分"这条链当初是怎么锁上的"和"它是不是真的对"——否则你受的所有教育，只会让你更雄辩地论证自己为什么不必改变。**夺回计算权**：把那套暗中给你的人生定价、加权的模型摊开——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、正常化的统计曲线、今天的评分算法，都是这套模型——看穿它按谁的目标函数在给你打分，然后拒绝把自己的全部人生，押在别人写的那一根标尺上。

这三样主权的夺回，构成了反抗的最小闭环：候选的名字可以改（命名权）→ 锁住的逻辑链可以断（判错权）→ 给你定价的模型可以被看穿和重写（计算权）→ 一个新的稳态可以被稳定下来（跃迁）。福柯用一生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命名、通过知识、通过统计来生产主体；而发生学告诉那个被生产的主体：你被生产，不等于你被封顶——这三支笔，你可以夺回来，重新参与书写你自己。这，才是"哪里有权力，哪里就有抵抗"这句话，被兑现成工程之后的样子。

拾伍

福柯之后：判根而不判果，与 AI 时代最深的稀缺

三座桥架完，福柯的三样缺失都补上了。但发生学对福柯的接续，还要再走一步——走进福柯没能活着看到的时代：人工智能的时代。因为福柯那道"反身不可封顶"的悬崖，在这个时代，长出了一个他不可能预见、却极其锋利的现实后果。

福柯毕生研究"关于人的知识"是如何被权力生产的。而今天，一种全新的"关于人的知识生产者"出现了——大模型。它读遍了人类的一切文本，它能对任何关于人的问题给出流畅的回答，它正在成为亿万人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的第一信息源。如果福柯还活着，他一定会立刻追问：这台机器，在生产什么样的"真理"？它把人塑造成什么样的主体？

发生学对这台机器，有一个福柯不曾有过的、更根部的判断。

发生学说：**信息发生，不等于知识发生**。大模型极其擅长处理信息——它的信息模态能力（E2）强得惊人；但它缺两样东西：它没有在现实界被反复校准的经历（它只有理念界的符号层，没有身体、没有现实的碰撞），它也没有自我界的赋义与承受（它不会为任何一个判断承担后果、赋予意义）。所以大模型是“反身发生的退化极”——它是一台只剩下理念界的、残缺的发生机。它的“幻觉”，不是偶然的错误，而是系统性的、不可自我纠正的**根部偏斜**——你去修它的输出，就像去纠正哈哈镜里的影子，影子改了，镜子还是那面镜子。

而这个判断，恰好把福柯的问题，推到了它在这个时代最尖锐的形态。福柯问“谁在生产关于人的真理”，发生学接着问：“当这个生产者是一台反身退化的机器时，谁来判定它生产的真理，其根基是否可靠？”

答案是一个发生学特有的、也是这篇长文最后的判词：**判根，而不判果**。

这是什么意思？面对大模型给出的成千上万个流畅答案，你去逐一核对每一个答案对不对（判果），是徒劳的——因为偏斜在根部，不在某一个具体的输出上。真正需要的，是一道“判根”的门：判定这一整套答案体系的根基是否可靠。而这道判根的门，机器自己没有——因为判根需要的，恰恰是机器缺失的那两样：在现实界被校准的经历，和在自我界承受、赋义的能力。判根，只能由**亲历过三界完整发生的人**来充当。

于是，福柯那道“反身不可封顶”的悬崖，在 AI 时代，长出了一个惊人的推论：**判根者的稀缺，是这个时代最深的稀缺**。当越来越多的判断被外包给机器，那个还能“判根”的位置——那个亲历过现实的校准、承受过自我的赋义、因而能判定一套答案的根基是否可靠的位置——变得空前珍贵。福柯担心的“权力生产主体”，在 AI 时代有了最新的形态：一个把“判根”也外包给机器的文明，等于自愿地封顶了自己的再发生。而守住“为人类保留判根之位”，就是守住这个文明反身的、不可被封顶的那道口子——那道口子，正是福柯用一生凿出的悬崖，在今天为我们保留的最后的、也是最深的尊严。

这里还藏着一个福柯若在世必会震动的反转。福柯毕生揭示：现代权力最深的作业方式，是通过“生产关于人的真理”来生产主体——它让你接受某套关于“你是谁”“什么正常”“什么该欲求”的知识，从而把你塑造成特定的样子。而大模型，恰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台“关于人的真理”的生产机。它每天向亿万人输出关于历史、关于社会、关于道德、关于“你该怎么活”的流畅判断，而且它的输出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“客观”外衣——它听起来中立、博学、不偏不倚，仿佛只是在“如实呈现”。这正是福柯最警惕的那种权力：把一套被生产的东西，伪装成“本来如此的真理”。当一个人越来越多地通过大模型来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时，福柯所说的“主体化”正在以一种全新的、规模空前的方式发生——只是这一次，那个递给你“认识自己的范畴”的，不再是教会、诊室或学校，而是一台你以为在“帮你查资料”的机器。

而发生学对此的回应，恰恰不是"所以要警惕、要抵制"这种福柯式的、只有拆解没有出路的姿态。发生学给出的是正面的判据：大模型的问题不在于它是"权力"（一切改变你的东西都带着不对称，都在权力的连续谱上），而在于它是一台**反身退化**的生产机——它生产真理，却没有在三界完整走过一遍发生，所以它的根是偏的。于是应对之道不是抵制，而是补根：为它外接一道判根之门，由亲历过完整发生的人来把关它的根基。这就把福柯的"警惕权力"，升级成了发生学的"给权力补根"——不是站在悬崖边警告世人不要靠近，而是在悬崖上架一道判根的门，让机器生产的洪流，在通过之前，先经过一次人的判根。这，是福柯的问题在 AI 时代最尖锐的形态，也是发生学在福柯止步之处，交出的最后一座桥。

拾陆

"一切都是权力"：这句话是清醒，还是滑坡？

在走向结语之前，必须处理福柯留给这个时代的一份最含混的遗产——那句几乎人人都会说的话："一切都是权力。"

这句话，是福柯思想被通俗化之后的产物。它在今天的知识空气里到处飘荡：一切知识都是权力，一切真理都是权力的建构，一切标准都是压迫，一切关系都是支配。凡是有人说出"这是客观的""这是对的""这有标准"，立刻会有人反驳："那不过是掌权者的话语罢了。"福柯的洞察，被稀释成了一件顺手的拆穿工具——用它，你可以拆穿任何东西，把任何"客观""正当""真理"都还原成"权力的把戏"。

发生学要对这句话，做一个精确的切分——因为它一半是清醒，一半是滑坡，而分不清这两半，是这个时代很多思想混乱的根源。

清醒的那一半：福柯对了。那些伪装成"永恒客观""自然而然""对所有人一样"的东西——正常、理性、真理、道德——确实不是先在的，确实是在具体的权力关系、具体的历史里被生产出来的。在"没有先在的、绝对的、脱离一切关系的客观标准"这件事上，福柯是清醒的，发生学完全站在他这一边。戳穿假的客观、假的永恒、假的自然，这是一种真正的清醒。

滑坡的那一半：从"没有先在的绝对标准"，滑向了"没有任何标准、一切都只是权力"。这一滑是致命的。因为它把"标准是被发生出来的"，偷换成了"标准是不存在的、是可以随意否认的"。可这两者天差地别。一座桥塌不塌，一个疗法救不救命，一句话安不安慰得了人——这些判断有它铁一般的约束，它们不理睬"一切都是权力"的宣言。标准不是因为"不是先在的"就不存在；标准是在具体的纠缠里、经具体的差异路径、被持续地发生并持续地检验出来的。它是发生的，所以它有历史、会演化、可以被批判；但它同时是被严格约束的，所以它不是任意的、不是可以一句"那不过是权力"就打发掉的。

而那把尺子——第一座桥——恰恰是分开这两半的刀。因为一旦权力是"关系中的不对称改变"这样一个**可测量的连续量**，"一切都是权力"这句话就立刻显出了它的粗糙。不，不是一切都是权力：影响是无处不在的，但权力是影响里那一份不对称的偏离。朋友的互相启发不是权力，是交流；一场对称的、可反驳的、双向的辩论不是权力，是论理。把"一切改变"都叫成"权力"，恰恰是福柯"权力无处不在"那句话被推到极端后的谬误——它让"权力"这个词失去了区分力，也就让"批判权力"失去了着力点。如果一切都是权力，那"批判权力"就等于批判一切，也就等于什么都没批判。

所以，发生学从福柯这里，提炼出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鉴别器，就像我们从德里达那里提炼出的那个一样：下一次，当你听到**"这不过是权力""一切都是建构""没有什么客观的"**，先问一个问题——说这话的人，是在戳穿一个伪装成永恒的假标准（清醒），还是在把一切标准、一切约束、一切"发生的成败"都一并否认掉（滑坡）？前者值得同行一程，后者要在起点处拦住。因为滑坡的尽头，是一种什么都可以被"那不过是权力"打发掉的犬儒——而犬儒，恰恰是权力最喜欢的臣民：一个相信"反正一切都是权力、反抗也没有真假对错"的人，是最不可能真正反抗的人。福柯若看见自己的思想被用来培养这样的犬儒，一定会痛心——因为他一生的工作，是为了让人更清醒地反抗，不是为了让更精致地投降。

拾柒

结语：掘墓人、接生婆，与悬崖上的三座桥

现在，可以为这场解构收束了。

回到最初的那个意象：福柯站到了悬崖边，却没有桥。

这场解构，走完了三层。第一层，我们看清了福柯的伟大：他把权力的镜头从高处的王座，掉转到了每个人的身体、路径、知识与自我；他证明了主体不是先在的起点，而是被生产的结果——在这一点上，他是发生学最深的同路人，是整个西方传统里离"发生"最近的人。第二层，我们看清了他缺的三样东西：他有权力运作的全部显微图像，却缺一把判定"是不是权力、有多深"的尺子；他看见权力在五花八门的地方运作，却缺一套把这些作业面组织起来的坐标；而最深的，他证明了主体是被生产的，却给不出那个反抗的"我"从哪里来——他站到了规范缺失的悬崖边。第三层，我们在他的悬崖上，架起了三座桥：最小判据的尺子，让"无处不在"变成"处处可测"；二十七个角度的坐标，让弥漫的迷雾变成可追查的矩阵；而反身不可封顶的定律，给了抵抗一个本体论的根据，填平了那道最深的悬崖。

福柯和发生学的关系，可以用一对称呼来收束。上一篇解构德里达时，我们说德里达是发现范式的**掘墓人**，却当不了发生范式的**接生婆**——他拆得彻底，却造不出新的。福柯比德里达走得远得多：他不只是掘墓，他还照亮了权力在毛细血管里运作的全部机制，他把主体拆到了本体论的门口。但在最后一步，福柯和德里达一样，缺了那个正面的、建设性的东西——他有"发生"的全部气味，却没有"发生"这

个正面的词，没有那把尺、那套坐标、那条填平悬崖的定律。他把主体拆到了悬崖边，却只能站在那里，一生地、诚实地，望着那道他自己凿出的深渊。

发生学的位置，恰恰在福柯的悬崖之上。它承接福柯的全部拆除成果——那些先在的主权者、先在的主体、被当成客观的正常规范，确实都塌了；但它不停在悬崖边——它往悬崖底下再挖一层，挖到了那个福柯没能挖到的岩床：**发生本身**。权力是发生的不对称，主体是发生的结果，而发生是反身的、不可被封顶的——所以主体虽被生产，却永远保有那个溢出生产、重新发生的可能。这，就是福柯一生站在悬崖边所渴望、却没能说出的那句话：抵抗不是神秘的剩余，抵抗是发生本身的、不可被夺走的自由。

福柯用一生凿出了西方思想史上最深的一道悬崖。而这道悬崖之所以值得被凿，不是为了让别人跌落，而是为了让后来者，能在它最深的地方，架起最高的桥。

掘墓的人已经掘完了墓，拆除的人已经拆完了旧世界最后一根梁。而现在，是接生的时刻——在那声巨响之后的寂静里，让人第一次听见，脚下那条一直在流、从未停歇的发生之河。

本文为“解构大师”栏目第一篇。以 SDE 发生学与《权力为何物：SDE 权力发生学》为思想背景，对米歇尔·福柯的权力理论进行原创性重构。福柯是这条道路上最值得敬重的先行者；本文的全部批判，都建立在对他的深切理解之上。

——王德生·德麦国际